

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对 哲学中修正主义的斗争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布·恰根著



660
B01
B01

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对 哲学中修正主义的斗争

布·恰根著

李元明譯

陈宝琛校



Б.А.ЧАГИН
БОРЬБА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ОТИВ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РЕВИЗИОНИЗМА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9
根据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譯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哲学中修正主义的斗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苏〕恰根著
李元明译 陈宝琛校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56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8\frac{5}{8}$ · 字数192,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4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2002·178 定价(七)0.91元
印数1,001—5,000

目 录

第一章 恩格斯反对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	3
第二章 列宁反对“合法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基础的斗争	49
第三章 修正主义的产生	78
第四章 修正主义和它的哲学基础	121
第五章 普列汉諾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的斗争	181
第六章 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馬克思主义者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的言論	203
第七章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及其哲学基础的斗争	239

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修正主义的分析，极其明显地证明它的理论立场和实际纲领是与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完全一致的。现代修正主义实质上是适应新的历史时代的条件而改装了的新伯恩施坦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和微小差异无法抹煞这样一个绝对的事实，即它的理论内容主要是由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以及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形式的老修正主义“思想”和“论据”构成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继承十九世纪末期的修正主义者，企图“调和”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反对哲学的党性，要求用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最新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历史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这个历史有助于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

本书阐述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和它的哲学基础进行斗争的几个主要阶段和这种斗争的规律性。列宁在这个斗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他第一个对修正主义作了不调和的、最彻底的批判，揭露了它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揭穿了它的各种变形，其中包括它在哲学领域中的各种变形。

列宁已经预见到，机会主义奉行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将有直接产生修正主义言论的可能性。列宁指出：“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

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穎的’問題、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沒有預先覺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內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①

現代修正主义者对革命馬克思主义的攻击充分证实了列宁的历史預見。

列宁以及革命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斗争的经验，是各国共产党在反对現代修正主义和它的哲学基础的斗争中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武器。

①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19—20頁。

第一章

恩格斯反对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 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在和它的最凶恶的敌人进行残酷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战斗的性格、高度的进攻精神和对敌视无产阶级的任何思想表现都坚持不调和的态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部著作本质上所固有的。这些著作，是深刻的科学批判分析和研究的范例，同时也是在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热情的具体表现。

恩格斯根据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活动和发展的经验，表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规律。他写道，无产阶级政党是与它敌对的思潮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完全符合辩证发展的规律。原则性的政治矛盾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长期地被抹煞和掩盖起来，必须用斗争去解决。无产阶级政党要得到巩固，就必须坚决克服它同敌对的思潮之间的政治矛盾和思想矛盾，清除异己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警惕地对待强使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接受与它们格格不入的思想的任何企图。他们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理论在争取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的极端重要的意义。恩格斯写道：“领袖的责任，特别是在于对一切理论问题具有更深的修养，使自己更多地摆脱属于旧世界观

的傳統說法的影响，并在任何时刻都意识到社会主义从它成为科学的时候起，就要求像对待科学一样地去对待它；也就是说，要研究它。”^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使无产阶级政党达到团结一致，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机会主义者、“和平”与“合法”道路的拥护者，同时反对主张放弃政治斗争、以自己的言论使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解除武装的无政府主义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鼓吹者。

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断地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所获得的票数不断增加的情况来说明。在九十年代，它已成为国内最有声望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在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日的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拥护它的选票达到一百五十万张。一八九三年，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得到了一百七十八万七千张选票。在这几次选举的前夜，恩格斯写道：“选举本身使我十分高兴。德国工人又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他们是用多么优良的经过千锤百炼的钢所锻炼出来的。”^②一八九八年，二百一十万七千选民，也就是参加投票的全部选民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十八，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③。

社会民主党的成长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这种发展则表现为罢工斗争的高涨和罢工人数的增长。九十年代罢工的

① К.Маркс, Избр. произв., т. II, 1940, стр. 442. («馬克思选集»第二卷，一九四〇年版，第442頁。)

② К.Маркс и Ф.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XVIII, стр. 18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第181頁。)

③ СМ.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 Bd.250, Berlin, 1912, Hft. 3. (見«德国統計»第二五〇卷，一九一二年柏林版，第三期。)

情况和結果表明了无产阶级在反对資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

九十年代罢工和歇业統計表①

年 代	冲突的次数	参加罢工人数	罢工的結果(百分比)		
			成功	部分成功	失敗
1892	73	3022	34.2	20.5	43.9
1893	116	9356	44.0	21.6	32.7
1894	131	7328	27.8	28.7	39.5
1895	204	14032	45.0	15.4	38.6
1896	483	128808	48.0	25.3	21.9
1897	578	63119	47.1	25.3	26.6
1898	985	60162	54.1	21.7	22.1
1899	976	100779	53.7	21.0	21.8

由下表所列的材料可以看出，职工会的会员人数也有显著的增加②。

年 代	中央职工会会员人数
1892	237094
1893	223530
1894	246494
1895	259175
1896	329230
1897	412359
1898	493742
1899	580473
1900	680427

① S.Nestriepke, «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Bd.I. Stuttgart, 1922, S.413.(斯·納茲特里普克:《职工运动》,第一卷,一九二二年斯图加特版,第413頁。)

② 同上,第297頁。

社会民主党和职工会报刊的广泛发展，证明了社会民主党所取得的成就。倍倍尔一八九〇年在哈勒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例举了以下的数字：在实施反社会主义者法案时，德国有四十二种党的机关刊物和十四种职工会的机关刊物，共有订户十七万户；一八九〇年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已经有六十种政治性的报纸，共有订户二十五万四千户，四十一种职工会刊物，共有订户二十万一千户；此外还出版了《新时代》（«Neue Zeit»^①）和《同路人》（«Gessellschafter»）等刊物。刊物总数达一百〇四种，共有六十万订户^②。

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开始时髦起来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驳，批判，要求马克思主义作出“让步”，他们用各种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资产阶级自由派沃尔夫，布伦坦諾，桑巴特等人十分活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涌入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

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和“朋友”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根据这个鄙俗的“理论”，经济基础自动地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政策和

①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从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二三年止，在斯图加特出版，在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新时代》杂志上登载过几篇恩格斯的文章。他经常给杂志编辑部指示并尖锐批判编辑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该杂志经常刊登修正主义的文章。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它采取了考茨基中派的立场，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译者

②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zu Halle, Berlin, 1890, SS.35,36.（《德国社会民主党哈勒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一八九〇年柏林版，第35—36页。）

思想只是经济发展的消极产物；宿命的先定性在历史上居于統治地位；发展不是经过斗争而是自发地进行的；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都无力对事件的历史进程发生或多或少本质的影响。

恩格斯对这种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给予了毁灭性的批判。一八九〇年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和康·施米特的信中驳斥了“经济唯物主义”的论据，他给真正的唯物史观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强调了它的创造性。恩格斯写道：“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话，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强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个经济力量啊！”^①

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资产阶级敌人和社会民主阵营中的伪装的朋友想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和死板公式的企图，也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例如，恩格斯在给保·恩斯特的信中写道：“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②

恩格斯坚决批判了唯心主义观点和“经济唯物主义”庸俗见解混合体的、与历史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青年派”的理论著作。恩格斯写道：“但是必须指出，这个反对派所暴露出来的这么多幼稚的荒谬论点和极端愚蠢的说法，我从来还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③

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某些领袖的理论著作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461页。

③ 同上，第262页。

表了严肃的批评意见。特别是批评了当时已经成为“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考茨基。恩格斯要求对历史的因素，对历史本身进行具体的研究。恩格斯指出，没有历史的知识，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变成公式。

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八月五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把它利用作为借口，以便不去研究历史。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这样说过：‘我只知道一件事，即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年青一代的德国人那里，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须知，经济史还只是在襁褓之中呵！）尽速构成系统，而后自豪地欣赏自己的功业而认为自己是最伟大的人物。”^①

恩格斯责备考茨基在他的著作中缺乏深刻的历史研究，没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对待现实。

但是梅林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列辛的神话》却得到了恩格斯的好评。在一八九二年三月十六日致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写道：“我现在已读完了梅林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关于列辛的神话》，这篇文章使我很满意。这的确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在某些部分，我可能会按另一种方式加以论证和更清楚地加以说明^②，但总的来说，他写得非常中肯。我高兴地看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二十年期间通常只是以言过其实的空洞文句出现于青年党员的著作之后，终于开始恰当地被用来作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179—180页。

② 梅林在一八九二年十月六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些意见促使他彻底的改正了《关于列辛神话》中的有关几章。

研究历史的指南了。”^①

恩格斯贊揚了梅林的著作。他认为这些著作是当时最优秀的作品。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致考茨基的信中也談到了这一点。但是恩格斯也沒有忽視梅林著作中的缺点。他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的信中談到梅林写的《論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时指出，梅林对于政治、法律、思想意识等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沒有給予足够的重視。这就是巴尔特和其它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用以責难馬克思主张“经济唯物主义”的得意理由。恩格斯恳切地向梅林指出：“我只是想让你今后注意到这一点而已。”^②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弗·梅林和亨·施塔尔肯堡的一些信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同时也是对“经济唯物主义”深刻的批判。恩格斯写道：“所以，并沒有什么经济状况自动发生的作用，像某些人认为着簡便起見而設想的那样，而是人們自己創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們是在他們受其制約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現實关系基础上創造着的，在这些現實关系中，尽管其它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而经济条件归根到底終究是有决定意义的，是构成为一个鮮明线索以貫串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令人能理解到这个发展进程的。”^③

以威·李卜克內西为代表的《前进报》的领导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新时代》的领导，并不是经常称职的。他們显然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九卷，第41頁。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99頁。

③ 同上，第505頁。

有足够的估計到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危险性。在報紙和杂志上刊登了折衷主义者的思想紊乱的文章。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义，传布新康德主义。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特別是《前进报》却经常不刊登保卫馬克思主
义哲学的文章和反对对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唯心主义的和庸俗经济主义的歪曲的文章。例如，普列汉諾夫为反对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歪曲而写的《保尔·恩斯特同志和唯物主义历史观》^①一文，根本就未能問世。

恩格斯十分忧虑地指出党的干部在理論方面的薄弱和党的領導对于理論問題的漠不关心态度。由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改良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更加說明了恩格斯的忧虑是完全合理的。

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在工人运动里引起了新的机会主义的出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迅速增长，也还有其一系列的具体条件。一八九〇年，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废除了。卡普里維的“自由主义时代”代替了俾斯麦制度。社会民主党在議会选举中的成就引起了和平和“合法”发展的幻想。

威·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它領袖有时曾以謹慎和合法作为党的政策的最高原則。恩格斯是反对这一点的。他在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我同意你的这一說法，即在目

① 普列汉諾夫著文批判巴烏尔·厄尔恩斯特的《梅林的〈关于列辛的神話〉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唯心主义的文章。后者刊登于一八九四年第二十七期和第二十八期的《新时代》上。普列汉諾夫写道：“但是，保·恩斯特同志在史观方面向我們說的，康德主义者很早以前就已在认识論方面談过了……”。（《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Г. В. Плеханова》，Сб. V, Соцэкиз, 1938, стр. 6.《普列汉諾夫著作集》，第五卷，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一九三八年版，第6頁。）

前我們應尽可能和平地、合法地行动，并且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借口。但是毫无疑义的，你对任何条件下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一概痛罵，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第一，反正沒有一个敌人会相信这点——須知他們并不会如此愚蠢；第二，根据你的理論，我和馬克思也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了，因為我們从来也不打算像善良的教友派信徒那样，如果誰想打我們的右脸时，我們就把左脸也轉过去让他打。毫无疑问，你这一次是作得有点过火了。”^①

右派分子原先不惜以任何让步的代价所换得来的合法主义，成了机会主义进一步脱离馬克思主义的起点。他們认为非常法的废除和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意味着“新时代”的降临，它要党采取新的路线，放弃老的革命策略，并且修正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改良主义的堡垒起初是巴伐利亚，这是德国一个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地区。

九十年代的头五年充滿了馬克思主义对福尔馬尔的改良主义和“青年派”的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1890年，施行了十二年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废除了。这时再次出現了其性质与七十年代中期相类似的党内危机。一方面，以福尔馬尔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准备利用合法性来抛弃不折不扣的口号和不調和的策略；另一方面，所謂‘青年派’則玩弄‘左派’儿戏并滚到无政府主义立場上去。”^②

福尔馬尔提出的問題不仅要求改变党的策略，而且順便也要求修正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这与机会主义过去的言論相比，无疑还是新的。福尔馬尔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先驅者，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191頁。

②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295頁。

实质上，前者已拟定了后者的纲領的要点。

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为代表的党的領導，由于受到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令人陶醉的成功和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影响，更加经常地采取了“合法主义的新路线”，而彻底地、尖銳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情况則越来越少見了。这一点特別明显地表現在九十年代的后五年，那时恩格斯已经去世了。

就是在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倍倍尔，尤其是威·李卜克內西，不仅纵容了机会主义者，而且他們自己有些觀点有时也违背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策略。威·李卜克內西在討論不幸事故保险法时曾经宣称：“我們把国家的目的和任务看得很髙，我們相信国家正在實現着消灭貧富之間的矛盾的文明任务；由于我們承认国家有这个使命，我們在原則上支持这个法案……。”

虽然这样，倍倍尔仍然是党的領導集团中最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威·李卜克內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恩格斯用自己的意見直接帮助了他們，恩格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路线的真正領導者。

虽然机会主义在党内不断增长，但是德国的社会民主运动有时却和机会主义的意願相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二十年中間，建立了大型的有紀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了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組織；社会民主党的报刊遍及全国。党在議会选举中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无产阶级受到了利用合法可能性的訓練以及为局部要求进行斗争的訓練。工人运动迅速壮大起来，虽然它主要是向广的方面发展。

恩格斯在世的最后五年正是第二国际存在的第一个五年。在馬克思逝世后，领导世界工人运动和反对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日益具有威胁性規模的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全部重任

都落在恩格斯身上。列寧指出，在這個時期“恩格斯一人繼續擔任歐洲社會主義者的顧問和指導”^①。恩格斯在新的條件下繼續他在前一時期和馬克思一道進行為爭取革命理論的純洁性和革命策略的彻底性而斗争。

列寧在談到這兩位馬克思主義奠基人這方面的活動時寫道：“現在，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以及馬克思）所作的勸告、指示、糾正、警告和教導中，貫穿着兩條路線。對於英美社會黨人，他們總是堅決號召他們同工人運動打成一片，鏟除自己組織中的狹隘的頑固的宗派主義精神。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總是堅決教導他們不要陷入庸俗觀點、‘議會迷’（這是馬克思在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九日的一封信里用的字眼）和市儈知識分子機會主義的泥坑。”^②

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的傳布和對機會主義的調和主義引起了恩格斯最深的憂慮。根據他的建議，提出了改變黨的哥達綱領的問題。在制訂新綱領時，機會主義者企圖將他們的原則偷運進去，恩格斯決定和機會主義者展開鬥爭。威·李卜克內西企圖重複過去在哥達時對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情況，想在討論綱領時排斥恩格斯可能進行的干預。但是，他的這個企圖未能得逞。

一八九一年一月十五日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寫道，“李卜克內西在哈勒關於綱領問題的演說中，為自己摘錄了幾段原稿（即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著者），從這個演說看來，他會採取一切手段使原稿得不到發表。”^③

一八九一年五月一——二日恩格斯在致倍倍爾的信中又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10頁。

② 《列寧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356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276—277頁。